

宋刻陶渊明集两种

陈杏珍

陶渊明集十卷 南宋刻递修本 清金俊明、孙延题签 清汪骏昌跋 二册

本书历经毛氏汲古阁、黄氏士礼居和杨氏海源阁收藏，世称北宋版《陶渊明集》。每半叶十行，行十六字，白口，左右双边。版框高20.15厘米，广13.7厘米。版心上端无字，中间刻“陶集”二字和卷数，下端记刻工名。每册皆以宋锦装面，外封面签题“陶渊明集上（下）”，题下印记已模糊，《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》云：

“签题系元人笔，不敢易去。”至今此签保存完好。内封面夹签题“陶靖节集 宋刻”，下端铃盖“俊明明襄”、“不寐道人”二印，此签题名系金俊明手迹。

金俊明字孝章，号耿庵，又号不寐道人，工诗善书，是清初吴县有名的藏书家，乾隆《苏州府志》有传。书外有锦套，套上签题“宋板陶集 孙延题签”。孙延，原名衡，字寿之，号蔚堂，清吴县人，诸生，能诗善书。锦套外有木匣，匣上题刻“集部 宋刻陶渊明集 甲编 士礼居藏”，从而得知此匣也是世间难得的文物。卷末墨笔书写“陶陶室藏靖节集第一本”一行，下铃“陶陶室”一印。《藏书纪事诗》云：“王芑孙《黄尧圃陶陶室记》：同年黄尧圃得虞山毛氏藏北宋本陶诗，继又得南宋本汤氏注陶诗，不胜喜，名其居曰陶陶室。饮余酒，属余为记。余未及为

也。后二年，又得南宋本施顾两家注东坡和陶诗。於是復饮堯圃家而卒为之记。”黄丕烈以读人间未见书为快，醉心于搜集宋版秘籍，自号佞宋主人。自得宋刻陶集，又托趣于陶陶，“君子陶陶……其乐只且”，藏书家倾慕陶渊明的诗风人品，因获得宋版秘籍而陶醉的神情，于此可见一斑。

书中钤盖的印章很多，有“桃源戴氏”、“啸庵”、“商微子后，自毫之吴，再迁于鄞”、“文彭”、“文彭之印”、“文寿承氏”、“燕巢”、“毛晋之印”、“子晋书印”、“汲古主人”、“宋本”、“甲”、“黄丕烈”、“士礼居”、“百宋一廬”、“士钟”、“闾源父”、“雅庭”、“骏昌”、“书画船”、“小有壶天”、“先都御史公遗藏金石书画印”、“东郡杨绍和字彦合藏书之印”、“协卿珍赏”、“聊城杨承训鉴藏书画印”、“东郡杨氏宋存书室珍藏”、“杨东樵读过”、“周暹”等等。藏书印章揭示了几百年间此书辗转流传的经历。

《百宋一廬书录》云：“‘啸庵’、‘桃源戴氏’、‘宋（按：应为‘商’字）微子后，自毫之吴，再迁于鄞’三印，验其篆文印色，皆元时人也。”

文彭，字寿承，号三桥。长洲人。文征明之子。是明代中期著名藏书家，又善书，以贡授秀水训导，擢南京国子助教。行事详见王世贞《吴中往哲传》。钱曾《读书敏求记》称赞文彭的藏书“精妙绝伦”。

“宋本”、“甲”是毛氏汲古阁珍藏宋本秘籍的特有印章。毛氏父子断定此书是世间绝无仅有的奇书珍本，毛扆曾用此本校俗本书，并于康熙壬辰写下了题记，此题记已收入《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籍》中。

乾嘉以后，此书为吴门黄丕烈所得。黄氏藏书，有“笼经史与百氏”、“又文海而诗山”之誉（见《百宋一廬赋》），此书是其中尤为难得的罕秘之本，被尊为陶陶室藏宋本陶集的第一部，

《百宋一廛书录》也有著录。

黄氏藏书，转归长洲汪士钟。此书有“士钟”、“閻源父”等印章，是黄氏转归汪家之物。汪士钟，字閻源，家饶于资，厚价广搜宋元旧刻以及四库未采之书。同治《苏州府志》有传。咸丰庚申以前，汪氏藏书散失，为常熟瞿氏、聊城杨氏所获。

此书约在道光己酉、庚戌年间归山东杨以增，《海源阁书目》、《楹书隅录》、《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》均有记载。杨以增，清聊城人，字益之，一字至堂，道光二年进士，谥端勤。藏书处名海源阁，其子绍和又筑宋存书室。清朝后期北方的藏书家中，以杨氏为第一，有南瞿北杨之称。

海源阁藏书散失以后，此书和宋刻汤注陶诗一起，被现代爱国藏书家周叔弢（暹）先生收藏，并由周先生捐赠给北京图书馆，成了名符其实的“国宝”。

自毛氏汲古阁秘本书目将此书定为北宋刊本以后，这一鉴定一直为后人所认可，沿袭了三百余年。黄氏《百宋一廛书录》云：“盖此北宋曾氏刊本也。”杨氏《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》云：“北宋本《陶渊明集》十卷。”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和版本学研究的深入，随着此书由私藏转变为公藏，对以往的鉴定有了重新考订的可能。北京图书馆经过查证，确定这是南宋绍兴年间浙江刻本，其刻书地，可能是明州。笔者认为，这一鉴定是可靠的。

历来定为北宋本的主要依据是书中所载的一篇《曾纮说》。此文很罕见，后世的翻刻本、传抄本大都不予转录。个别转录的，文字或有出入。今移录全文如下：

“余尝评陶公诗，语造平澹而寓意深远，外若枯槁而中实敷腴，真诗人之冠冕也。平生酷爱此作，每以世无善本为恨。顷因阅《读山海经》诗，其间一篇云：‘刑天无千岁，猛志固常在。’且疑上下文义不甚相贯，遂取《山海经》参校。

《经》中有云：刑天，兽名也，口中好衔干戚而舞。乃知此

句是‘刑天舞干戚’，故与下句‘猛志固常在’意旨相应。五字皆讹，盖字画相近，无足怪者。间以语友人岑穰彦休，晁咏之之道，二公抚掌惊叹，亟取所藏本是正之。因思宋宣献言：校书如拂几上尘，旋拂旋生。岂欺我哉？亲友范元羲寄示义阳太守公所开陶集，想见好古博雅之意，辄书以遗之。宣和六年七月中元临汉曾纮书刊。”

上文有篇名标题，名为《曾纮说》。

曾纮字伯容，号临汉居士，宋南丰人。父阜为曾巩从兄弟，家于襄阳，遂为襄阳人。东莱吕本中将曾纮、曾恩父子取入“江西诗派”。杨万里云，曾纮一世豪俊，而能文，其诗源委山谷先生，有官而终身不就列。（据康熙《南丰县志》和《诚斋集·江西续派二曾居士诗集序》）

以《曾纮说》确定版刻年代，有一些疑点：

第一，此文落款所署“曾纮书刊”四字不好理解，纵观全文，也难以得出曾纮刻印陶集的结论。而且，将介绍刻书事宜的序文自名为《曾纮说》，这种情况实属少见。这个标题不像一般刻书时所印的新序标目，倒很像后人翻刻时所辑录的前人旧序标目。另外，本书在《曾纮说》一文之前，还收录四篇文章，依次为：刘宋颜延年撰《静节徵士诔》（按：静，应作“靖”），梁萧统撰《传》，《北齐杨仆射休之序录》，《本朝宋丞相私记》。《曾纮说》排列在上述四文之后，更象旧序。再有，“曾说”第一叶自标题起至“间以语友人岑”止半篇文字，原刻已佚，今所存者为抄配叶，在没有其他佐证的情况下，不能依据抄配叶来确定版本年代。

第二，本书也不是宋徽宗宣和年间义阳太守所开雕的陶集。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后集》中记载：“余家藏靖节文集，乃宣和壬寅王仲良厚之知信阳日所刻。”义阳即信阳。胡仔还摘录了王厚之的后序。从后序得知，王厚之刻本已改正二百几十字，如将

“八友”改正为“八及”，而有《曾纮说》的宋本却仍作“八友”，与王厚之刻本不相同。

第三，本书中遇到宋讳，除玄、敬、警、惊、殷、恒、贞等字缺笔外，宋钦宗名讳“桓”、“完”二字也缺笔，有一处遇宋高宗名讳“遘”字也缺笔，而且避讳缺笔不是在补版叶，而是在原刻叶上。这一情况说明，本书不是北宋刻本。又查书中“慎”字不缺笔，则此书的版刻年代应在宋孝宗之前。

第四，本书版心保留了不少刻工名字，为鉴定版本年代提供了牢靠的证据。因年代久远，有的刻工名字已漫灭损毁，有的却依然完好清晰。今摘录刻工名字如下：方成、黄晖、王仲、王伸、王寔、施章、王雄、张逢、吴珪、章、洪茂、陈俊等。又有“洪明重刊”、“杨昌重刊”、“吴宝重刊”、“吴宗重刊”、“施祥（按：“祥”字不很清楚）重开”、“胡端重开”、“李涓重刁”、“王进重刊”、“陈文重刁”、“陈俊重刊”、“王谅重刁”、“施俊重刊”、“朱坦重刁”等等。其中“重刁”、“重刊”、“重开”混用，即使是同一刻工名下，也不一致，如“王进重刊”，也作“王进重刁”。刁，应是“雕”的省写。

上列刻工，并不单独出现在《陶渊明集》中，在南宋浙江地区所刻的一些书中，也能见到他们的姓名。如：

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《尚书正义》，宋讳“慎”字不缺笔，应是南宋初年初本，此书刻于绍兴地区，书中留有刻工陈俊等姓名。据日本长泽规矩也《宋刊本刻工名表》记载，此书还有刻工王进、方成、黄晖、施章、吴珪、洪茂、王伸、王寔等。

南宋绍熙三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宋元递修本、即著名的黄唐本《礼记正义》、刻于绍兴地区，宋刻部分的刻工有李涓，陈文，施俊、吴宝、吴宗、杨昌等。

南宋初年杭州或宁波刻本郭注《尔雅》，宋讳缺笔至“遘”字，与《陶渊明集》避讳相同。此书也有刻工方成、施章、洪茂

等。

南宋绍兴年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《唐书》，有刻工方成、黄晖、施章、吴圭、洪茂、陈文等。此书刻于绍兴地区，宋讳缺笔至“构”字。

南宋绍兴年间杭州地区刻本《水经注》，有刻工洪茂、方成等。

南宋绍兴年间刻嘉定以后修补本《白氏六帖事类集》，有刻工方成、洪茂、施俊等。

南宋乾道二年泉州南郡庠刻本《孔氏六帖》，有刻工陈文等。

南宋淳熙二年严州刻本《通鉴纪事本末》，有刻工吴宝、杨昌等。

南宋淳熙刻本《宗门统要集》，有刻工朱坦、杨昌、王寔。

南宋初年刻本《愧郾录》，有刻工李涓。

综上所述，从《陶渊明集》原刻部分的刻工，可以推断：其刻书年代应是在南宋初年，政局大致稳定，避讳又趋于严格的时候，也就是高宗绍兴年间；其活动区域应是在浙江东部，以杭州、绍兴为主。“重刁”部分的刻工，也都在南宋一代刻过书，其中的陈俊等人，绍兴年间即已刻书，可见，陶集是在绍兴年间版刻，并且在南宋初期就开始补版。补版的地点，也应在浙江。

此处值得一谈的，是南宋绍兴年间明州刻版。绍兴二十八年开始修版的六臣注《文选》，此书宋讳缺笔至“构”字，原刻部分的刻工和补版部分的刻工与《陶渊明集》大为相似，两书的版式也相似。此外，与《陶渊明集》版式相似的，还有明州刻本《白氏六帖》，其刻工也是方成、洪茂、王伸、施章这些名手。由此推断，《陶渊明集》可能也是明州刻本。明州，也称四明，今为浙江宁波市，古代交通便利，经济繁荣，是南宋重要的版刻地区。

陶靖节先生诗四卷 晋陶渊明撰 宋汤汉注 宋刻本

清周春、顾自修、黄丕烈跋 清孙延题签 二册

汤注陶诗四卷，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经籍门著录，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失收。此宋刻本，与《陶渊明集》的宋刻本一起，称得上是宋刻陶集中的双璧。周春跋中说：“是书乃世间所希有，宋刻之最精者也。”每半叶七行，行十五字，小字双行同，白口，左右双边。版框高18.9厘米，宽13.3厘米。版心上端刻字数，两鱼尾之间刻卷次和叶码，下端有刻工名。鱼尾之间标志卷第的用词不统一，分别刻“诗一”或“卷一”，“卷二”、“二卷”或“诗二”，“卷三”、“三卷”或“诗三”，“卷四”或“诗四”。封面签题“汤注陶诗 上册 甲戌春孙延题”、“汤注陶诗 下册”。书外锦套上签题“陶靖节诗集 汤伯纪注真本”，签上钤“堯夫”一印。锦套外有木匣，匣上题刻“集部 宋刻汤注陶诗 甲编 士礼居藏”，从而知道此匣也是黄氏士礼居故物，两陶集俱有黄氏书匣，更可宝贵。卷末墨笔书写“陶陶室藏靖节集第二本”一行，下钤“陶陶室”一印。每册首末俱用金粟山藏经笺宋人写经作护叶，护叶上钤盖“金粟山藏经纸”印记，此护叶也是世间罕见的珍品。周春跋云：“此本大字端楷，作欧阳率更体，颇便老眼，且校讎亦鲜‘形夭’、‘庾钓’之讹，装后覆阅数过，诚可宝贵。”

书中钤印很多，从印色看，此书的收藏已有相当历史，时代较早的印记有“秀石”、“铎”、“景仁”等。明末至今有案可查的重要印记有“董宜阳”、“项印禹揆”、“子毗父”、“子毗所藏”、“项子毗真赏章”、“著书斋”、“周春”、“松霭”、“菴兮”、“松霭藏书”、“海宁周氏家藏”、“松磬山房”、“内乐村农”、“黄丕烈”、“士礼居”、“县桥”、“陶陶室”、“闾源真赏”、“汪印士钟”、“闾源父”、“汪印振勋”、“宋存书室”、“东郡杨绍和字彦合藏书之印”、“东郡杨氏海源阁

珍藏”、“协卿珍赏”、“杨保彝藏本”、“周暹”等等。

周春跋云：“卷尾有‘董宜阳’印，宜阳字子元，自号紫冈山樵，华亭人，上海诸生，工诗文，善书法，与何良俊、徐献忠、张之象才名相亚，有四贤之目。”

项禹揆字子毗，秀水学生，明末人。《明诗综》有小传。《藏书记事诗》将项禹揆与大藏书家项元汴列在一起，云：不知其辈行，士礼居藏宋刻陶集即其家本也。

周春字范兮，海宁人，号松霭，晚号黍谷居士，乾隆十九年进士。自称内乐村农，室名著书斋。

黄丕烈，吴县人，于嘉庆七年迁居东城县桥，并构百宋一廛书室贮藏宋本秘籍。“县桥”是黄氏迁居以后的印记。

书中周春、顾自修、黄丕烈的题跋叙述了本书的流传始末，留下了可据以考信的藏书掌故。周春之前，此书流传日久，纸墨敝渝，破旧的外观掩盖了内在的光彩。曾为鲍廷博所得，并送海盐张燕昌，鲍、张二人一时疏略，未能识别。乾隆四十六年被周春以借观的名义巧妙取走，不肯归还，赖他人从中调停，用叶元卿梦笔生花大圆墨作交易。乾隆四十八年，本书正式归周春。周春将它装修一新，与宋刻礼书并储一室，取名礼陶斋，又言欲以殉葬，却被书贾用激将法设计买走。周春先失去礼书，改室名为宝陶斋，既而又失去汤注陶诗，改室名为梦陶斋。去书之日，泣下数行，此老当时的懊丧心境，恐非言辞所能表达。嘉庆十四年，本书为黄丕烈所得，从此黄氏书屋又增添了斋名“陶陶室”。之后，此书又归汪士钟。道光己酉、庚戌年间，杨以增借仕宦之便访书吴门，于是此书和宋版《陶渊明集》一起，又成了杨氏“四宝居”之二宝。曾几何时，此书又归周叔弢先生，并捐赠给北京图书馆。

美中不足的是，书中有些藏书家钤盖的印记过密，令人不无遗憾。《藏书记事诗》中感叹这种情况像“十斛明珠聘丽人，为防奔月替文身。”并引《韵石斋笔谈》作注：“墨林（项元汴）

每得名迹，以印铃之，纍纍满幅。譬如石卫尉以明珠精镠聘得丽人，而虞其他适，则黥面记之，抑且遍黥其体无完肤，较蒙不洁之西子，更为酷烈矣。”

从版刻上看，本书具有福建刻本的风貌，写刻精美，似应出自建中良工之手。卷前有淳祐初元九月九日汤汉自序，旧时因而定为“宋淳祐元年汤汉刻本”，北京图书馆对这个鉴定作了更正。

第一，可从刻工来推断刻书的时间和地点。本书留下了一些刻工名：蔡庆、邓生、张生等，有些叶上留下了单字刻工名：庆、吴、清、江（或镌“江梓”二字）、青、蔡（或镌“蔡刁”二字）、张、梓等。这些刻工是鉴定版刻时代和地点的重要依据。从现存的其他宋刻本来看，宋咸淳元年建宁府知府吴革刻本《周易本义》，书中也有蔡庆、邓生、吴清、吴文等刻工名，宋咸淳年间建宁府另一任知府吴坚刻于福建漕治的《张子语录》，也有吴文、邓生等刻工名。据此推断，汤注陶诗的版刻年代和地点，应与《周易本义》和《张子语录》大致相近，也应是咸淳前后建宁府所刻。

第二，汤汉曾在福州任知府，任职期间最有条件延请当地名工来刻书。汤汉字伯纪，饶州安仁人。据《宋史》本传，真德秀在潭，致汉为宾客，江东提刑赵汝腾荐汉于朝，任信州教授兼象山书院院长等职务，淳祐十二年，（公元1252年）差充史馆校勘，改国史实录院校勘。从籍贯与早期经历来看，淳祐十二年以前，汤汉不太可能延请建宁名工来刻自注陶集，福州也不太可能有人会刻此书。又据《宋史·理宗本纪》，景定五年（公元1264年）正月庚子，太子谕德汤汉知福州。本传中未说明知福州的时间，只记载以秘阁修撰知福州、福建安抚，改知隆兴府。度宗即位（公元1265年，即咸淳元年）召奏事，任京官，又曾知宁国府。久之，以龙图阁待制知福州、福建安抚使。可见，在度宗即位、即咸淳元年的前后，汤汉最有条件延请建宁名工来刻此书，这与《周易本义》、《张子语录》的版刻时间、地点正好一致，上距淳祐元年

（公元1241年）已有二十四年左右的时间。

宋版《陶渊明集》和《陶靖节先生诗》是研究陶渊明及其著作的重要版本。

陶渊明是东晋的大文学家，《晋书》、《宋书》和《南史》三史都有传，可史书中却连他的名字和著作都记载不一。关于他的名字，或云陶潜字元亮，或云陶潜字渊明，或云字渊明名元亮，或云名渊明字元亮，加上唐人为避讳而改作“深明”、“泉明”的，事实很难澄清。吴仁杰编陶渊明年谱，指出“陶渊明字元亮，入宋更名潜”。他的依据，主要取自陶集中一些自我介绍的诗文，所以要考订翔实，得出社会公认的结论，还必须研究陶集本身。但是关于陶集的疑点却更多。北宋以前史书著录的本子有多种，卷数互不相同，且均已亡佚，流传下来的是经过宋庠、思悦（宋治平中苏州虎丘寺高僧，名见清顾湄撰《虎丘山志·高僧传》）等人重新编辑的本子。各种本子的卷数不同，篇目不同，文字上的差异也很大，而且伪作间出，疑窦时生。

宋刻陶集作为现存较早的版本，可提供去伪存真的较早依据，《陶渊明集》中有道光二十八年汪骏昌跋，云：“盖所贵乎宋版者，为其可以正时俗之谬误，而好古者得开卷之益也。”汪跋简明地指出了宋版陶集在校勘、辨伪方面的功用。

第一，对研究和剔除伪作有价值。这两部陶集对伪作的处理比较慎重，采取存疑的态度。凡已经意识到是伪作的诗文，都于篇末加小注作说明，如“种苗在东皋”一首，《陶渊明集》在诗末加小注“或云此篇江淹杂拟，非渊明所作”，汤注陶诗将此首和其他几首可疑的诗移至卷末，也加小注作说明。陶集中的《五孝传》和《集圣贤群辅录》，清高宗弘历已判定是伪作，乾隆以后一些有影响的刻本也作了删除，宋版《陶渊明集》不仅完整地保存了这两部分内容，而且《集圣贤群辅录》的分卷还与后世一

些本子不相同，如自“太傅高密元侯南阳邓禹”至“纪弟司空掾谡字季方”一段文字，宋本属卷九而刘履芬抄本却属卷十，这为研究陶渊明的思想，进一步判断是非提供了完整的资料。

第二，对校勘陶集、订正文字有不可替代的作用。这两部陶集的文字，与传世的一些本子不尽相同，保存了较多的异文。汤汉在校正文字、注释内容方面下的功夫较深，曾受到马端临的赞扬，被称为陶渊明异代之知己。宋版《陶渊明集》，毛扆称它“与世本夔然不同，如《桃花源记》中‘闻之，欣然规往’，今时本误作‘亲’，谬甚。《五柳先生赞》注云‘一本有‘之妻’二字’，按《列女传》是其妻之言也。他如此类，不可枚举……真奇书也。”又如：卷三诗前一段注文，辨析陶诗是否入宋以后才不署年号、只用于干支纪年的问题，一些通俗本也有这段注文，但与宋本文字出入很大，详略不同。又如《冷庐杂识》中指出：“陶靖节《归去来兮辞序》一百九十八言，叙次详尽，语朴旨深，有此辞必有此序，而其美始全。近世坊本往往芟去不刻，谬矣！”明万历四年周敬松刻本就未刻此序，而两部宋本中却都有此序。

以上两部宋版陶集，无论是对作者研究还是作品研究，都具有极重要的价值，是古籍整理、研究中不可忽略的资料。此外对研究南宋时期的雕版印刷和鉴定一些古籍版本，更有不可取代的作用。加上封建社会长期处于闭塞状态，两书未能充分发挥作用，因而也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

陸士衡先生詩集卷第一

停雲一首并序

停雲思親友也樽酒新醪園列初榮願

言不從歎息彌襟

霽霽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

阻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

延佇停雲霽霽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

陶淵明集卷第一

詩九首四言

停雲一首并序

停雲思親友也樽酒新醪園列初榮願

言不一作從歎息一作彌襟

霽霽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

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

停雲霽霽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

有酒有酒熙熙飲東籬願言懷人一作舟車

陸從東園之樹枝條一作載榮競用新野